

卡夫卡在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写过一架人间的车和两匹非人间的马。就像他曾因文体晦涩而让很多读者望而却步一样，这两匹健壮的驃马在一个窘迫的暴风雪之夜相拥出现，也难免让人觉得神秘莫测。他这样收束自己的小说——“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里，我一个老人赤身裸体，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四处奔波，饱受严寒的折磨”。行文至此，卡夫卡似乎向我们暗示了一种理解其自身的方式，而这个文本的复杂性也正在于它包含着两种叙述：现实的与非现实的，或者说他始终试图从一种日常的叙述通向形而上的超验层面。

在我看来，《乡村医生》提供的不仅是理解卡夫卡的人口，它甚至也昭示出20世纪以来困扰整个人类的精神困境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创作。事实上，现实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构成了人们生存中的普遍困境，从巴尔扎克的“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到卡夫卡的“一切障碍将摧毁我”，预示着一个现代社会的到来，而“上帝已死”以及许多形而上的价值被遗忘，人们失去了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当所有碎片式的普通日常奔涌而来，文学到底该以怎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提供了“人间的车”“非人间的马”和一个变化中的“时代”。这不仅提示我们，文学创作始终和时代与社会的症候息息相关，同时，在呈现20世纪以后最不缺少的个人日常生活之外，它还可以指向一种超验性的思考，甚至是失去旧有信仰之后的进退失据。按照苏格拉底诗人爱德温对卡夫卡的阐释，卡夫卡被看作一个“怀疑主义时代的宗教寓言作家”，这或许略显偏颇，因为他也的确一直试图在一种世俗的确定性中嵌入包含信仰在内的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

卡夫卡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伟大的现代小说，也为我们反观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其实20世纪以后，东西方普遍面临着存在的危机，而“每一次存在的危机都把世界的现实性和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置于疑窦丛生的状况之中”。《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这就需要人们找到一种解决危机的范式，这种范式很可能有着先验式的起源，而且很可能只是从现实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超凡世界中所得到的启示。现代文明始终是与理性、科学、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在取消世界神秘性的同时也取消了人类对生命、对世界敏锐的感受力，而文学恰恰是一种可以穿梭于现实与超验之间的实践，它可以介于现代文明以及不可言说的神秘之间，创造一种理解，也召唤一种感受。

而中国的文学自古只侧重谈“世间事”，孔子用“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将先民神话合理化，基本上已经昭示出中国文化对现实人生、社会伦理的执著，而对抽象世界中的来世、死亡、灵魂等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缺乏关注。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将其概括为“实践理性”，一切都是以生活的实用为核心的，这就使这种高度理性甚至过早理性化的文化结构与西方的“思辨理性”区别开来，因而文学自然也多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相联系。而像《红楼梦》这样依循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逻辑，将世俗人间事无巨细的“色”与“情”放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无常的世界）中，并最终指向一种虚幻的叙事，甚至在主体故事之外，用一个更大的、宗教性的终极性结构，建构起中国长篇叙事整体性的作品可以说凤毛麟角。老舍早在1942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反思，他认为中国的小说作品“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层的文字”（老舍《灵的文与佛教》），即便出现了一些超越日常生活的字眼，除却宣教目的和非文学性的劝世文之外，更多的则是借助小说的模式来完成对世俗的道德伦理训诫功能。因此他发出了一次对“灵”的文学的倡导以及以建设“灵”的文学来救赎人类灵魂的期许。老舍的这一判断并非夸大其词，在中国重“实有”和“现世”的文化体系中，人们对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的兴趣远远高于对一种超验性的、神圣世界的向往。夏志清在《中



# 「人间的车」与「非人间的马」

——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观察

□褚云侠

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提出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宗教感的缺失，或者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国文学的精神脉络中始终缺少一种形而上层面的终极关怀。的确，新文学以来，取得最大成就的或者占据最重要位置的仍是“现实主义文学”，虽然“现实主义”这一说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被赋予不尽相同的意义内涵，包括我们近些年重提和展开讨论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得以形成的概念。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回到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最初的表述来考察这一动态过程，仍然会发现“现实主义”万变不离之“宗”，其实是对现实世界确定性的追求。细节的真实、典型的环境和典型的人物，都是确定的、清晰的，可从现实生活中抽取关于这个时代的核心知识、场景、形象，甚至还包括一个可以许诺的、有着确定指向的未来。

现实主义很好地契合了我们认识、理解、呈现这个世界的诉求，它在将来也必定继续保持着巨大的文学阐释力。但是，在不断加强现实主义创作的前提下，我们需要有更加丰富的文学范式，并以此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进行强化、提升。从最初的起源来看，其实万事万物的生发，都是处于原始的、神话的结构之中。在一些作家看来，被现代科学所固定下来的具有确定性的世俗生活是一种神圣结构的产物，这种神圣结构可以不断地重新获得，它是神秘的，甚至也是不确定的、非逻辑的，而对这一结构的探索也成为了这些作家对文学的期许。就像作家穆齐尔对诗人家园的描述：“对每一个判断的理解、每一个概念的意义都被一个更柔软的经验之外壳包裹着，作为以太，被一种个人的意愿和数秒之后就变化的个人无意识所包裹。这个领域中的事实及其关系是无限的，难以捉摸的。”因此，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这种柔软的经验之外壳所孕育的无限可能性其实不仅是去寻找那些可以被纳入社会

规律的固定物，还应该不断去发现新的关联、未知和例外。而作者和读者其实也都存在一种隐约的期待，他们期待文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止于一种对现世挣扎的呈现，同时还应包括可以瞻望未来之生活的方向，甚至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人类所要全力以赴、挣扎通往的永恒。

可以说，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从缺少一架人间的车，可一旦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得以安身立命，往往精神的问题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时人们意识到，我们还需要在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而正如学者胡河清所言，“终极关怀的信念确实可以成为一个人在精神世界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肃穆的境界，一种至上的感悟，一种爱与创造力的源泉，一种个性发展的最为充分的形式……”当我们沉溺于“现代”生活所最缺乏的“日常”时，往往也会遇到叙事的困境和难以以为继。这其实不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也是一个精神的问题，是丰富的贫瘠背后所携带的难以名状又不知所向的单薄感。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将小人物、琐事为质料的叙事引入文学潮流，在冷静客观地呈现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真相之后，却始终无法在琐碎庸常的重负之下升腾起一种超越性的自我救赎之力。而在当下的很多作品中，大多数小人物也仍然徘徊在生活中遭遇着的情感迷失、生活挤压和欲望驱使之中，很少触及对灵魂的拷问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求。巴赫金在论及伟大作家的“两种视野”时，提出作家首先要触及重大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其次他们可以聚焦于琐碎狭小的空间，但这些都是与生命的目的和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以这“两种视野”来考察，很多作家与巴赫金所说的“伟大作家”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不是没能对重大社会现实本质因素有所呈现，而恰恰在于对生命、灵魂体悟的先天不足，这种体悟就是很少能见到的那两匹“非人间的马”。

但是正如两匹“非人间的马”所牵引着这一架“人间的车”一样，它们其实缺一不可，无法分割。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到过两个动物形象：鹰与蛇。二者不是敌人，反而亲密地相互缠绕，进行着同步协调的圆周运动。这正是人心两种力量的象征，人向往高远的视野和崇高的精神观照，但是又无法摆脱在地经历所形成的智慧、本能与元气。精神观照不是建立在抽象之上，而恰恰是依托于这些最扎实的生活和确定性的表达。因此，更具难度的写作不是以抽象写抽象，不是单纯的寓言化写作，也不是点到历史为止，而应该是在最为具体、确定的现实和历史中生发和抽离出形而上的思考。雷蒙德·卡佛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作《大教堂》，和其他那些作者与人物身份重叠的日常故事不太一样，这是一次例外的写作，也是一个转折。小说前半部分姿态低到几乎完全沉浸在世俗的婚姻生活中，而随着盲人来到“我”家，情绪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日常生活在一个“打开电视”的空虚中开始和神圣的大教堂建立起关联，当“我”和盲人罗伯特手握着手画出大教堂时，精神从谷底上升，往上、往上，一直升向天堂。对于卡佛而言，他说：“《大教堂》是个例外……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写作……”

再回到卡夫卡“人间的车”与“非人间的马”，其实“非人间的马”正是要让精神适时滑出日常生活的轨道，捕捉到例外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一定不是精神的平原，而是“人间的车”所能驶向的奇迹，但最終仍会指向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以及它的未来，而这或许正是写作之于人类的意义或者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写不可。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 及物性·亲切感·“腕力”

——对当下新诗写作的观察 □卢辉

在生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特别是当我们被整齐划一地置于网络之中，一切都欲使我们变得更加规范化、更加标准化的时候，诗歌以其特有的方式协调起来，把揪心的事态压缩为诗歌中的平衡效果，以试图安抚疫情之下人们的复杂心理。在这些“为事而作”的抗疫诗歌中，诗人们在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时，不是回避、失语，而是敢于直面、反思，还原时代真、善、美的一面，并重新来审视世界和自己的灵魂。

2020年以来，不少“为事而作”的抗“疫”诗，无疑凸显了诗人们的承担意识。这些诗人常常以宏大的激情、敏锐的视角和直面的勇气，让抗疫事态进入人们的视线与心扉。据了解，《诗刊》《星星》《诗潮》《诗歌月刊》《诗江南》等诗歌刊物和众多微信公众号都纷纷加入推广抗“疫”诗的队伍中。古往今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几乎成了铁律。这场“为事而作”的抗“疫”诗歌写作中，诗人把为事而激、为事而作的“伦理在场”用来“平衡”事态，把不寻常的感情状态、毫不懈怠的关注力协调起来，把揪心的事态压缩为诗歌中的平衡效果，以试图安抚疫情之下人们的复杂心理。在这些“为事而作”的抗疫诗歌中，诗人们在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时，不是回避、失语，而是敢于直面、反思，还原时代真、善、美的一面，并重新来审视世界和自己的灵魂。

作为“及物性”或者说“及事性”的诗歌写作，这些作品正好召集了许多诗人的“联合在场”。很多读者看重的也正是这种“联合在场”的“原生状态”，看重的是物我之间直接的、原始的能动力反应，是那种热腾腾刚蒸出来的语言，像一场豪雨一气呵成，而不是断断续续、零零散散的“叙说”。这些抗“疫”诗歌传达出人与人、人与世界相互依存的情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诗歌写得过于“急躁”，语言还不够精练。在如何把握及物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一些作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不仅仅是抗疫题材诗歌写作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下诗歌创作整体面临的困境。

在当下，作为诗人的“我”，一旦被置入繁复、驳杂的大千世界，怎样才能从常规通向高处而不至于沦为琐碎，这就考量着诗人如何在智性与良知的驱动下，在“现实尺度”“生态指涉”与“心灵图景”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的确，诗人的心灵有时真像是一个储藏器，收藏着无数感受、经验、现象、意象、词句……诗人需要在诗歌中将这众多元素重新融合成新的东西。

诗歌的“图景张力”，离不开诗人为其搭建的“可见、可听、可感、可思”的实体空间。其实，一首诗要建立起一种独特心情的实体并非易事，尤其是这个“实体”的构成既要让人充满好奇心与期待感，又要让人觉得它符合人们的情感温度和理想秩序。但是，想写出具有“图景张力”的好诗，诗人不仅要把握现实所见所闻，还要关注物、人与物之间相容、相生、相对的临界点上的“折射效应”。这样的“图景张力”所呈现出的正是独具个性的精神之光。一首好诗，总会包裹着一个隐性的“精神秩序”，总会不时地展开“图景”的张力。

伴随着及物性写作的不断涌现，诗歌的语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常的题材、日常的语言、娓娓道来的口吻，让诗歌增加一种亲切感和亲和力。当然，这种倾向可以无限地往前推，甚至可以反推到遥远的“诗经时代”。但就当代新诗而言，在1985年之后，随着口语在诗歌中的广泛使用，这种写作路径变得愈加明显。

口语诗歌的力量，来自它的本真。由经验、真情萌发的“口语”，带有亲切的感受、微妙的分寸感。这些都是口语表达的魅力所在。鲜活的语言风格、生动的叙事细节、亲切的语调口吻，让口语诗歌回归到“言说”本位，回归到“传情”本位。正如诗人都愿所说，很多诗人平时的诗歌创作未必都是口语风格，但他们的口语诗就是他们的真情在瞬间的流露，可感觉，可触摸。

口语诗歌要“说”到点子上，“说”到心坎里，避

免口语变口水。如上所述，诗歌的口语应是物我之间直接的、原始的能动力反应，是那种鲜活的语言，让人读来情真意切。鲜活的口语接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与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密切相关。由这些语言，诗歌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世界。

因此，口语诗歌写作，既要“眼到”，更要“心到”。口语诗歌不是写到口语为止，而是要由口语延伸出复杂的况味。因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需要对语言有高度的掌控度，又要有非凡的视角。一旦写不好，就成了口水诗。好的口语诗歌正是在口语叙述与诗意推进中，找到了一种“可说可感”的心境表白，营造出亲和、意外的美感，成功地将抽象的心境变成可感的心境。

从《诗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百年新诗这样一个漫长时间跨度中，口语一直为书面文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与创新的动力。目前，亲和力已成为口语诗歌的重要特质，为新诗走向大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的确，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百姓生活、抵达人们心灵的口语诗歌，那亲切而率真的口语表达、真实鲜活的视觉画面、触手可得的在场视角、交融互动的个人体验，更新了读者对新诗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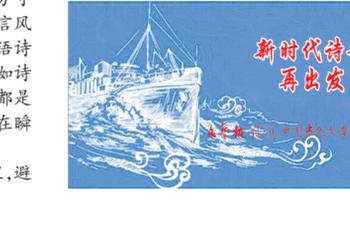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要让口语诗歌真正“说”出内在的诗意，光靠口语诗歌对现实的“生存还原”还不够，还要善于打开遮蔽在生活常态中不易显形的图像，要从互仿性很强的“公共面貌”中游离出来，在口语叙事中藏有智力的机锋和精微的细节力量，让口语诗歌真正成为这个时代亲切而独立的“精神标本”。同时，要让口语诗歌散发现实与心灵的“图景”，不能只在“小我”中苦心经营，而是要将个人精神与时代气象相互呼应，进而拉长口语诗歌的写作链条，拓展它的宽度，这才是新时代口语诗歌良性生长的路径。

新时代的诗人都有种观察时运与关注命运的习性，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时代尊严、生命尊严都是值得书写的。如今，诗人作为现实气场、文学场景和精神效果的“制造者”，已经显示出非凡的雄心与气度，这就需要一定的“腕力”。就像掰手腕，不管是输是赢，要的就是最后一下的“腕力”。

那么，诗歌写作的“腕力”是什么？它肯定不是所谓的解构与分解、挥霍与颠覆的“力”。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掘进的“力度”，是一种渗透的“力道”，是一种努力去搅腾的气度。这种“腕力”与语言的“张力”不同，语言的“张力”说的是语言自身有形或无形的意义“增幅”与“扩张”，而诗歌的“腕力”说的是诗人自身秉性“渗透”于母语中的“增量”与“纵深”。

的确，诗歌写作需要开启内在的“精神推动力”，它与旺盛的生命力、感悟力形成“合力”，最终形成了诗人自身的人文经验和生存体验的言说机制。应该说，从“腕力”这个层面上来说，诗歌写作就像是树立一座雕塑，要的就是雕刻出情感的纹络和思想的肌理。一首有“腕力”的诗，往往能够在准确的意象“穴位”，延拓的意境“时空”，质感的思想“肌理”、直观的精神“立面”上“用力”。的确，诗是广阔人生阅历和宏富的学养融渗而成的，尤其是谙熟人生与人性所积蓄的“腕力”给了诗歌极其广阔的表达空间。

由此可见，在诗歌写作中，诗人总在万事万物的胶着中启动“腕力”，以有力的诗句表达出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景观。



## 《敦煌：生而传奇》 生动再现历史文化

本报讯 3月21日，由腾讯视频推出的纪录片《敦煌：生而传奇》在京举办看片会。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陈晓卿、企鹅影视纪录片工作室总监朱乐贤等与会，并在映后与观众互动交流，分享各自对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思考。作为人类共同创造和拥有的文化宝库，敦煌汇聚多国文化孕育的璀璨丝路文明，联通中西方文明，丰富了华夏文明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作为一部人物纪传体、剧情式传奇纪录片，《敦煌：生而传奇》以情景再现、纪实拍摄、专家访谈等内容，从全球视野揭秘鲜为人知的神秘敦煌，讲述众多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深入解读和探究敦煌从边陲小镇成为国际重要商业枢纽、丝绸之路著名节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原因。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讲述具有颗粒感的故事，拉近历史与观众的距离，使人们重新认识这座蕴藏人类文化基因的殿堂。

《敦煌：生而传奇》曾获得艾美奖的跨国团队合作，邀请导演冯小刚配音、作家马伯庸等联手解读，呈现从汉朝到晚唐时期班超、沮渠蒙逊、武则天等多位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为打造精美绝伦、栩栩如生的大片质感，该片采用杜比视界格式制作。全片共5集，将于3月25日起每周四更新，在腾讯视频同时上线中英双语版本。（范 得）

## 峭岩长诗《七月！七月！》系列三诗会举行

本报讯 “一把镰刀的传说，镰刀的锋芒穿透所有的铁，它的最前方，是一把斧头，斧头是方向的指南。如磐的夜它们在梦中拥抱了，斧头与镰刀的交叉，合成一个图腾……”在演员饶立群激越的朗诵声中，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中诗会拉开序幕。此次云中诗会，由中国建军研究会、人文文学虹韵艺术团联合主办。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弘扬“百年征路，百年辉煌”。活动计划分五场进行，2月26日举行了首场活动。

据悉，峭岩长诗《七月！七月！》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作品。评论家吴思敬为这部诗集作序：“《七月！七月！》，打破了多年来节日献诗的窠臼，不再是编年史的分行，全诗以强烈的民族自信拥抱大地，以冷隽的目光审视历史，以理想的光芒烛照未来，从而为当代诗歌的宏大叙事开出了一条新路。”诗人岳宣义发去贺信，倡导大家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诗人薛斌赋金星发去贺词：“镰刀和铁锤的史诗交响！红旗和诗露的歌风飞扬！军号和平仄的青铜铿锵！”人文文学网总编王博生认为，作家与朗诵家的合作，必将为观众呈现出一部别致的令人振奋的史诗。诗人、评论家绿岛代表中国建军研究会致辞，作家刘辉做总结发言。

诗会由团长李虹策划导演，艺术总监栢荷主持。朗诵家马晓蓬、李军、李士光、吴姗姗、子莲、刘文志、桑叶、北松、赵秋云、籛馨、邵今春、杨华等倾情演绎。

（李 虹）

## 薇薇安·迈尔个展亮相京城

本报讯 3月20日，“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策展人安妮·莫林、今日美术馆馆长张然联合策展，艺术家彭薇担任展览总监，为观众系统展示了传奇摄影师薇薇安·迈尔的83张自拍系列作品和9个超8毫米影像作品。作为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神秘摄影师，薇薇安·迈尔一生的经历一直是摄影界热议的话题。在担任保姆工作的几十年间，她独自拍摄了超过10万张底片，且从未示人，直至晚年生活窘迫才不得已拍卖随身物品。自2007年她的才华被发现以后，有关她的解读从未停歇。2010年，她的作品开始在欧美多个国家展

出。此次展览是薇薇安·迈尔的首次国内大型美术馆个展，全面呈现了其最迷人也是最复杂的“自拍系列”，筛选出隐藏她一生经历的人物肖像，打造了一个让观众近距离与其对话的艺术场域。

主办方表示，薇薇安是一个孤独的奇才，通过她的自拍影像，越加清晰地呈现出一个关心社会、热心生活、以旁观者角色记录时代变迁的普通人。她勇敢地游走于城市的角落，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此次展览探索了她性格中不同的层面，和她在不断寻求自我身份时运用的各种表达方式。“如果说这些影像宣告了她的存在，那或许是因为她本来是“隐形的”，与众多相似社会环境中的人一样。”展览将持续到6月30日。（范 得）

## 纳·赛西雅拉图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纳·赛西雅拉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6日在呼和浩特去世，享年88岁。纳·赛西雅拉图，蒙古族，中共党员。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珍贵的礼物》《第一个早晨》《蒙古诗歌史研究》等。曾获索龙嘎奖等。